

米，右侧长86，宽17厘米，额侧长48，宽17厘米，阴长66，宽76厘米，是现存拓片中比较完整者之一。六行“万嗣”之“嗣”字，七行“六纪”之“纪”字，八行“非书不记”之“不记”等字尚可辨认。顾千里对此拓片十分重视，亲自用墨笔标明阴、阳、左、右顺序并于碑穿处钤“顾广圻印”，碑阴处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印，同时还加盖少用的“千里”印记四方，在右下方题“苍颉庙碑”，以示珍贵。

（执笔人张聪贵）

戴震之“志以考地理”

清乾、嘉时兴修方志之风最盛，有识之士终年笔于四方，有善于订定志例，有长于考证沿革，有工于撰述词章。后人称以戴震为首一派，为“考据派”，以章学诚为首一派，为“撰著派”，二派所纂成之志，至今犹称上品。

戴震修志以古今沿革为首要，说：“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于地理沿革，则志事已竟。”

方志莫难于辨沿革，而戴震最精于考地理沿革；如震辨《元和郡县志》汾州一条中，纷然不治者六，详见震《与曹给事学闵书》。如此志震考子夏设教西河，在龙门，西河不在汾州，此正唐人之。误又从晁以道之说，以汾州之吕梁、狐岐，释《禹贡》治梁及岐辨旧说；以苏子瞻、曾彦和、阎百诗、胡臚明之穿凿，详晁以道之所不能详，斥蔡仲默引书耳食之病，使学者晓然。其考该之精详，以正历代诸家之说，非通儒大师则不能为此。然而当时的章学诚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书》直斥震经术淹贯，而不解史学。考证古地理，而与治经、史何分，学诚“六经皆史”之说，岂自相矛盾。学诚对震之评价，不能使人认为是完全确当。

戴震所著考据地理之书，及所纂方志，于乾隆三十年成《水经注》一卷，于三十三年修《直隶河渠书》未竟稿，三十四年纂成《汾州府志》，三十五年龚导江修《寿阳县志》，聘震点窜，又为辨正，三十六年纂成《汾阳县志》，仅在六七年成水利书和方志五种，均为著名之书。

· 陈光贻 ·